

在多重空间运思

——当代文学研究三十年 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选

当代文学研究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是我国当代文学长足演进的三十年，也是当

代文学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

代文学研究室，也正是在这三十年中，追踪着历史的脚步与文学的

足迹，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诸方面不断自我提升，逐步发展壮大，

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多重空间运思

——当代文学研究三十年 论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多重空间运思/朱寨 等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当代文学研究室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889-0

I. 在… II. ①朱…②中…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9503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张文芳

在多重空间运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1 千字 开本 88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889-0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路径与思潮

朱 寨	文学的新时期	3
张 炯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总格局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	25
孟繁华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当代文学	41
李洁非	延安与当下	62
白 烨	压力下的生长	69
张 韧	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	94
曾镇南	营造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	114
蔡 葵	改革小说的美学特征	127
樊发稼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概述	143
蒋守谦	考察新时期短篇小说艺术变革的参数	159

问题与论说

张 炯	当代先进哲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175
杨匡汉	漫说当代文学生态	203
吕 林	“两结合”创作方法问题研究	215
陈福民	历史与人生的风雨卷舒	226
陈晓明	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	250
刘士杰	论朦胧诗	268
楼肇明	台湾散文风景线	288

陈素琰	文学广角中的一个世界	308
刘 平	关于新时期戏剧创作的思考	321
李 晨	中国新文学作家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339

学科与前沿

杨匡汉	在多重空间里沉潜与运思	355
王 排	女性文学批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364
李建军	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写作的诸问题	384
徐 坤	双调夜行船	403
田 泥	当代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	435
周 瓚	先锋诗歌论纲	451
杨 早	新世纪文学:传媒时代的困境与重生	467
白 烨	“80后”的现状与未来	480
杨 鹏	中国卡通“卡”在哪里?	497
李兆忠	历史的报应	507
编后记		516

路径与思潮

文学的新时期

朱 寨

我们的文学创作已经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文学已呈现出自己显著的特点并取得了新的成就,这都是公认的事实。如何恰当地分析和评价,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我在这里谈几点基本看法。

滥 觞

新时期的文学概念,是由新时期的历史概念派生的。所谓历史的新时期,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关于文学的新时期一般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决议》同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天安门事件”,已经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我们分析研究新时期文学,也应该从中得到启发,追根求源,找到它的滥觞。

既然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民族的阶级的神经,历史性的决战,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文学自然会做出应有的感应。诗歌在天安门前那场搏斗中,成了群众手里的“旗帜和炸弹”。几天时间涌现的难以数计的诗歌,可以抵上一个时期的诗歌总数,其思

想感情的分量,更不是一本《天安门诗抄》能够表现的。严格地说,“天安门诗歌”还称不上一次“诗歌运动”,因为绝大多数是挽联和古体诗词。尽管不少诗词放在历史上同类优秀之作中并不逊色,但究竟没有艺术形式的独创,而是传统形式的利用。可悲的是,当时人民只能利用这种被允许的传统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志。其实我国诗歌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始,就已经突破了僵固的旧形式,建立了新诗的阵地。而适宜表现现代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的自由体和新格律诗被废置,新诗被迫缩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旧壳中去,这不但不是新诗的前进运动,反而是艺术上的倒退。可喜的是,也有新体诗和散文诗趁机冲出来赤膊上阵。不过数量居少数,也无艺术的追求,仅仅是率性的歌哭,顾不上语言形式上的修饰,即使其中最佳者,也未超过新诗已有的一般艺术水平。称为“诗歌运动”,那就不仅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探求、革新、建树。天安门的群众诗歌还没有来得及在艺术上有所突破,就与群众运动一起被扑杀了。但是,体现在天安门诗歌中的人民情绪、历史要求、时代召唤,却是流贯于新时期文学的源头活水,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根本特点。

新时期出现的第一批优秀诗歌几乎都是天安门诗歌的回声。其中最感人的诗篇,还是源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歌哭。例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从文坛上失踪二十年复归的艾青,放开喉咙歌唱的第一首长诗《在浪尖上》,也是讴歌的“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韩志雄。新时期出现的一代文学新人,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丹心谱》的剧作者苏叔阳,本是中医学院的一位政治课教师,天安门前的花海歌潮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这个处女作就是彼时彼地孕育的。第一个表现“天安门事件”的剧本《于无声处》,写成于“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一个青年不惜冒政治风险,执笔为这段历史树碑立传,本身就说明创作惊雷起于无声处。更晚一些出现的大型历

史话剧《秦王李世民》，根据作品的内容，人们料想一定出于老手，其实作者只有二十五岁，是在大学历史系就读的女学生。“天安门事件”时，她仅二十岁。但这“难忘的历史巨变”使她“一下子似乎懂事得多了”，立志把历史教训搬上当今的舞台。她刻苦努力数年，终于遂愿。天安门的悲歌，激发起了创作应“为人民鼓与呼”的使命感，鼓舞和坚定着作家的勇气和信心，新时期文学的悲壮主旋律不是源于此，也是始于此。

转 折

从时间上来说，新时期文学应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胜利算起。而文学上的历史性转折，却应该以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为标志。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界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控诉、讨伐，仅仅是讨还政治上的血债。虽然批判了“四人帮”迫害文艺界的主要刑律“文艺黑线专政论”，却未敢触及它的由来和依据。如果“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始作俑者即那篇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彻底推翻，他们赖以据的“两个批示”不收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石就不会摇动。即使“四人帮”覆灭了，在“两个凡是”下面，这还是一个思想禁区，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深入探讨，更谈不上。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在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的时候，重新唱起了被“四人帮”长期禁锢的历史歌曲，扭起了秧歌，大批劫里逃生的作品重见天日，确实有一种“文艺复兴”的景象。创作上也出现了一批歌颂老一代、鞭挞“四人帮”的作品，特别是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总的说来，这时期的创作在思想艺术上还没有历史性的突破，如取材依然因循着公认周知的政治事件；现成的政治主题先行，无非是歌颂和暴露；“三突出”的流毒未除。翻阅当时的作品结尾，照例是

“感谢某某，一举粉碎‘四人帮’”，由此可以看出公式化的创作练习还没有被触动。

文学的真正转机是在思想战线的大转机之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文艺理论的深入探讨和创作水平的突破，都是从这里开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做了“祝辞”，祝辞对于我国文艺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出对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得横加干涉；再没有提倡某一创作方法是最好的方法，解除了长期对文艺创作的束缚。特别是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体现了文艺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革。

本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们的文艺方向问题讲得很全面、广泛，但长期以来，出于形势的需要，却把它解释和规定得十分片面、狭窄。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只提“为工农兵服务”，排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广阔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变成狭窄的“工农兵方向”，以致曾出现过“只表现工农兵，只表现给工农兵看”的“工农兵电影”创作的论调。因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广阔的生活领域成了禁区。在抗日战争年代，无数爱国知识青年离乡背井，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过着艰苦的集体生活，本身就具有革命的诗意，而在我们的作品中却一直没有反映。这不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吗？有的作品曾接触到这方面的生活，不但没有受到鼓励，反而受到严厉批评。全国解放前东北解放区曾出版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动荡的十年》，描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前后的生活历程，颇受青年读者欢迎，还受到国外的注意，有几种外国译本。可是，受到全盘否定的批评，该书和作者从此销声匿迹。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也因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的问

题,在解放初期受到批评,作者还做了公开检讨,到不久前才重新出版,为人肯定。早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有人曾提出“小资产阶级可不可以作作品主角”的问题,引起了一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风波。当时结论性的意见虽没有做正面回答,但在强调写工农兵的意义下,自然意味着写小资产阶级暂缓。后来竟有人明目张胆地向已有定评的《青春之歌》发出了檄文,指控《青春之歌》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兵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结合,书中所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兵大众的结合,判定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进行创作”。最后不得不请茅盾同志出来收场,重新肯定了《青春之歌》。但茅盾同志的文章对那位发难者只指出了他批评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回避开了他有恃无恐的观点、论据。最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律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自然也就从人民大众中放逐出去,推入资产阶级阵营,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创作和评论也就噤若寒蝉了。

与“为工农兵服务”并行的“为政治服务”,长期以来也受到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僵硬的理解和解释。本来《讲话》关于为政治服务的范围,讲得很宽泛,“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在当时,就是服从抗日的任务。在《讲话》中“政治”、“政治路线”都是作为“革命任务”的同义语运用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特别做了说明:“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而长期以来,对“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恰恰出于把两者庸俗化。随之而来把政治性和真实性分割对立起来,从根本上伤害了艺术的生命,阻碍了对生活的深刻反映。往往狭窄到为当前的临时政治任务,甚至为某

一领导的政治意图服务,才是为政治服务,完全歪曲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意,取消了文艺的独立意义。我们创作上司空见惯的题材狭隘雷同、主题的重复“撞车”、公式化和概念化这些顽症,不应该从这里找找病因吗?“四人帮”打着“为工农兵”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号搞阴谋文艺,居然能欺世蒙众,不值得深思吗?邓小平同志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关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因此文艺工作总的口号的变化,是鉴于历史经验教训,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既是拨乱反正,也是变革发展。为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标志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

实 绩

由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说全国各条战线随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不错的。但就文学是否可以称得起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还应该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衡量。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指出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虽始于1915年,而1918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的陆续出现,才“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因此,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被视为“五四”新文学的开篇。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作家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结合了;如果不意识到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的变化,自觉地和新的群众相结合,文学创作也不可能呈现出崭新面貌,表现出时代的特点。新时期文学在作品和创作队伍两方面,都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同面貌和实绩。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在短短几年内,短篇小

说创作的数量是惊人的。从 1977 年到 1980 年被评选为全国优秀作品获奖的短篇就有八十篇。一时出现这样多的优秀短篇，确是空前的。更引人注目的是中篇小说的兴起。中篇小说这种形式，解放以前和以后都较少，写入文学史的不过是可数的几部。而近几年产生的中篇小说，比过去数十年的累计还要多，被评为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就有十五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照，与 60 年代前后相继出现的一批优秀长篇质量比较，还逊色些，但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数量是很可观的，而且也产生了具有这时期特点的优秀代表作。

从新文学史看，短篇小说的兴起，往往走在其他小说形式的面前，标志着一个时期文学的开端。《狂人日记》、《差半车麦秸》、《小二黑结婚》都是它们那个文学时期的开篇之作。同样的，刘心武的《班主任》也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作品中创造的宋宝琦、谢惠敏两个形象和反映的生活内容是过去作品中没有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有人概括为“伤痕文学”，那么，我要说，代表作不是别的，而是《班主任》。它描写的不是生活表面的伤疤，而是揭示了“四人帮”给我们一代人造成的精神扭曲。宋宝琦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扭曲的形象；谢惠敏何尝不是扭曲的形象？后来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继续反映了“动乱十年”在一代青年心灵上留下的烙印，继续发出不同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

中篇小说的崛起并非偶然。当短小的篇幅已不能容纳要表现的复杂生活内容，长篇创作又须缓待时日，中篇小说便应运而生。首先使用并且连续使用中篇小说形式的作家是从维熙。这位 50 年代的青年作家，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了扩大化的打击，“文化大革命”中又陷入了真正的“冤狱”，过着“劳改犯”的生活。当他一旦重见天日，那积久蓄深的生活体验，急迫倾诉的创作激情，是不难想象的。他的出手之作就是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可以看出，作家未及斟酌比较就操起了这个

应手的器械。这时期中篇小说的特点,不像《呼兰河传》的“凄婉的歌谣”情调,不似千锤百炼的《铁木前传》的炉火纯青,倒是接近《在和平的日子里》的“皱着眉头看生活”,矛盾尖锐,感情激荡。其中《人到中年》等十余部获奖中篇,不仅是中篇中的力作,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硕果。

长篇小说所以没有引起读者如对中、短篇小说那样的关注,因为绝大多数的长篇还是反映的历史题材,而任何时候广大读者首先关切的是当代人的命运。但并非这时期没有自己这方面的代表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全面开阔地反映了十年动乱年代的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既写出了生活上空的迷雾,也写出了脚踏实地的人民在混乱中的清醒、信心、毅力,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艺术上可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媲美,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它所创造的典型环境“葫芦坝”,也像“三里湾”、“清溪乡”、“蛤蟆滩”一样将被记载进我们文学典型环境舆图。它所创造的许茂和他的亲戚邻居们,也像《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中的人物们一样,将被列入我们文学典型形象的画廊。

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代中青年作家的崛起。这代青年作家的特点是都与自己的同龄人一起经历了十年动乱,从坎坷的生活道路上一齐跌打滚爬过来的,他们必然成为同代青年的代言人。这批中年作家,早在50年代就显露才华,绝大多数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受到挫折,从此被打入生活的底层,尝尽甜酸苦辣,可以说与新中国一起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同底层人民一起尝尽生活的辛酸。他们重登文坛,不是恢复故我,而是饱蘸着生活的血泪,为祖国和人民谱写新篇。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都是出于这批中青年作家之手。他们这几年写了大量作品,也并未在自己的成名作水平上停滞,而是不断突破猛进。每个时代都应有自己的歌手。新时期文学已有了自己的乐队。当然,他们

和他们的作品都还要经受时间的筛选,但已有的贡献在这段文学历史上刻下了,谁也抹煞不掉的印迹。

开 掘

我不同意用“伤痕文学”概括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这并不是说“十年动乱”不是和不应该是新时期的重要题材。有人一看到写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就皱眉头,表示反感,似乎作家故意戴着墨色眼镜看我们国家的生活。其实,应该想到一个明显的先例和浅显的道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给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多少这方面的创作题材?长达十年的动乱,怎能不在文学这面社会生活镜子里留下形象呢?我不愿称新时期文学为“伤痕文学”,因为它远不是平面地照出一场灾难的表面血污。它不仅揭示了灵魂的内伤,而且开掘健美的血肉和生机。

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提笔创作的第一个短篇题目叫《灵魂的搏斗》。作品没有着眼于描写老干部如何身受折磨,而是写了老干部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在威胁利诱、个人荣辱面前,受到的考验。有的为了做官而出卖战友;有的坚守革命节操,坚强不屈。两个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一个战壕里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战友,因此而分道扬镳,展开了激烈的“灵魂的搏斗”。这篇作品的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当时大量作品的内容。从最早一批获奖短篇中的《辣椒》(张有德)和未获奖的短篇《忏悔》(张洁),更可以看到关于这场灵魂搏斗描写的深度。《辣椒》里的县农林局局长王双合,并不是“四人帮”的追随者,“从大处说来”也是一个受害者。由于他没有遵守自己的革命指路人宋大伯“千万要顶住”的叮嘱,一时“心迷腰软”,认为“该顺着的时候,也得顺着点”,失掉了原则,造成了宋大伯与他革命感情的破裂。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宋大伯与他恢复了来往,虽然王双合从宋大伯那里又勉强讨得一串曾是象征革命深情的辣

椒,也“只有辣味”,却缺少感情了。王双合从中体味到“‘顺着’的心和‘顶着’的心是贴不到一起的”,“大考验中破裂的感情,还需要经过大考验才能融合”。小说描写的是大考验以后的余波,从这余波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考验多么严峻。

《忏悔》描写一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因为自己委曲苟安地活着而使自己的儿子谨慎胆小、可怜巴巴。“天安门事件”前夜的气氛,使儿子的眼睛里闪出了生命的火花,他写了一首诗,要到天安门去张贴,父亲为了顾全身家,恐吓喝止了儿子。儿子又蜷缩回孤独寂寞的角落,抑郁而死。恰在这时他接到恢复党籍的通知。双重的忏悔拷打着这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丧失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共产党人的天职”;没有“把对真理的信仰、对生活的信念,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传播给他那至亲至爱的儿子”。他忏悔在这场斗争中“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不曾做过什么”,忘记了任何时候不应该忘记的共产党人的天职。作品写出了这场灵魂的搏斗对人的革命信念的锤炼和净化,有一种道德的威慑力。

这些作品在鞭笞丑类邪恶的同时,歌颂了英雄正气。王蒙的《最宝贵的》描写了一个自称“老兵”的老布尔什维克严一行,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战役打下来,他鼓励自己有病的心脏:“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他以掷地作响的语言教训自己的儿子,要认清用欺骗和讹诈,玩弄和摧残了少年的信念和真诚的蛇蝎,要懂得在个人“前途、名声、称号”面前,更值得心疼、更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以发聋振聩的声音喊出最宝贵的是“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也是响亮地揭示了同类作品的主题。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可以说用文字塑造了一尊新时期的英雄铜像。一位人们不知其姓名的将军,从仪态举止上人们推知他曾经“用双脚丈量过全中国的土地”,至今还有“号令千军万马的赫赫声威”,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充军”到偏远乡镇。他并不因此离群索居,而在人民群众中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他